

责编:唐龙泉飞 美编:张晓 组版:方茜 校对:王文富 E-mail:ztrbtkb@126.com

被请进来的一方碑与一座墓

曹阜全文/图

当我们跨过棂星门,进入昭通文庙,面前会被一个亭子遮挡住视线。从亭子的风格和形制上看,这显然不是文庙应该有的亭阁。走近一看,上面写着“汉孟孝琚碑亭”几个大字。

据考古发现,昭通的确是有一方可以追溯到汉朝的碑,在城东太平街道办事处白泥井被发现,这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事。那年农历五月,村民马正卫在家附近的一座梁堆前,发现一块高过地面一米多的石碑。马正卫文化水平不高,只好进城把发现石碑这件事情讲给好友胡国桢听,胡国桢听了也觉得古怪,便约请当时城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谢履庄一起前去查看。没想到这一去,便揭开了埋藏在地下一个千古之谜。3人请当地村民掘地五尺,把整块石碑弄出地面,擦去碑上的泥土,上面的文字逐渐清晰起来。在谢履庄看来,这块石碑非同寻常,左刻龙,右刻虎,下刻龟、蛇,文字苍劲有力,书法古朴、文辞典雅,非平时所见的寻常石碑。比较遗憾的是,碑出土时不完整,只有下半截,上半截却没有找到。为安全起见,谢履庄当即安排马正卫用牛车把石碑运进城,放在凤池书院。

后来的情况,大家知道得就比较多了。经过仔细辨识,残碑高1.4米,宽0.96

米,右起左行,遗文共14行260字。当谢履庄等人把碑文拓片寄给北平的学者,学者们惊呼,称此碑为“滇中瑰宝”“海内第一石”。碑文所记,是一个叫孟孝琚的青年才俊,生于四川,四岁失母,十二岁随父至朱提,虽博览群书,兼通孝经二卷,天资聪颖,可惜天不假年,尚未婚配,永寿二年(156),英年早逝。武阳主簿李桥、书佐黄羊、书记李昂、钤下任驛四人应孟父所托,留下了这篇悲天恻地的祭文。可能就连他们也没想到,这块碑后来见证了东汉时期昭通的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与中原的联系。后昭通著名学者谢履庄认真考据,补全碑文,精研书法,让我们今天得以欣赏到汉代朱提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辉煌灿烂,幸甚至哉。

揣摩建此碑亭,是为了保护原碑,让其免受风侵雨蚀。2005年夏天,因为工作需要,我陪着云南省书协副主席赵浩如走进碑亭。看着孟碑,赵浩如一下子被镇住了,他戴上眼镜,认真端详、仔细揣摩这1000多年前的古物,眼睛里闪烁着少有的光芒。因碑石为昭通本地的砂石,虽用木盒遮蔽,但风化仍然严重。为了保护,文物部门多年不许拓片。碑文虽已不清晰,但一笔一画,仍然钝滞沉重如初,在书法名家眼里,仍是至高的境

界。赵浩如随后与昭通本地书法家交流,一直赞叹不已。

经过汉孟孝琚碑亭,继续向里走,在泮池南侧,可以见到一座近3米高的圆形古墓,这显然也不属于文庙应该有的建筑。据文物专家介绍,这是东晋霍承嗣的招魂墓,也是一处不可移动的文物。

这处文物的出土要比汉碑晚62年。1963年3月5日,砖瓦厂的工人在昭通城西北郊日圃镇后海子中寨村的一座梁堆上取土时,惊奇地发现覆土下藏着一座古墓。墓门被土遮掩,有一处狭窄通道进入,可惜墓内空空如也,显然被盗墓贼光顾过,取走了墓里的东西,唯一让工人感到新鲜的是墓内室壁上画着一些画,却不知道画的是什么。3月11日,后海子发现古墓的消息被当时昭通师范学校一个叫韩达斌的学生报告给在校任教的谢履庄。谢履庄向昭通专员公署文教科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勘察,得到了古墓的第一手资料,并撰写新闻稿在《光明日报》《云南日报》等媒体发布。

据后来整理发布的资料可知,该墓坐北向南,形似穹窿,墓顶覆斗状,石块镶砌,高约2.6米,南北进深3.05米,东西宽2.8米,南方有可开闭石门。墓室正中北壁,有墓主坐像。四壁条石砌成,抿糊石

灰,用墨和彩色绘成壁画,像右有隶、楷、行3种书体直行的题字120多字。字下,绘有人物10余个,呈练武、唱歌、舞蹈状。东壁绘有手持长条经幡的武士14人,西壁绘有部曲形象,共3排,每排武士十三人,披毡、跣足。

据谢履庄等专家考证,该墓应为东晋年间所建,墓主人霍彪,为曾任蜀汉梓潼太守、裨将军霍峻的曾孙,祖籍南郡枝江,曾任晋建宁太守、兴古太守、交州刺史,成都县侯。作为武将,在当时的朱提一带活动过,最后卒于蜀中,按祖籍地荆楚习俗,在朱提修筑安魂墓。墓室的形制,是当时梁堆文化的反映,更重要的价值是墓里的壁画,是研究晋代朱提乃至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和佐证,其珍贵性、独特性、艺术性不言而喻,而且,墓中壁画所反映的内容如朱提大姓、夷汉部曲等均得到了史料的印证,难能可贵。

或许是上述原因,1965年11月,有关部门决定将该墓迁移,每块条石都编号,复原安置于昭通地区实验中学内;1981年,建永久保护室,题名为东晋霍氏壁画墓室。后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正式命名为东晋霍承嗣壁画墓。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无论是汉孟孝琚碑,还是东晋霍承嗣壁画墓,都属于不可移动文物,墓和碑的保护,一般是原址保护,城里按常理也不适合放这些墓葬之类的东西。那为什么这2000年左右的文物还会迁移放置在城里,并且安放在具有崇文重教的文庙,我揣测是因为出土时的保管条件和保护措施所限,如果不搬

走,难以对这些国家级文物实施有效的保护,可能会导致文物被破坏甚至流失,届时再亡羊补牢就来不及了。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之前文物部门或者考古专家采取的措施是否科学,况且当时也没有文物保护法规明确应该怎样处理。100多年过去,这两处文物被完整地保护了下来,成为我们对朱提汉晋文化进行研究的珍贵实物,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功过不用评说。

1961年,汉孟孝琚碑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晋霍承嗣壁画墓也一同纳入保护范围。自此,两处文物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在昭通古城的恢复建设中,从保护的角度,汉碑和晋墓不能再次进行迁移,如果迁移,必然会造成再一次破坏。放在文庙之侧,可作为对后世进行历史教育的素材,也可让外地到昭通古城游历的人们体会到昭通历史的厚重。

就梁堆而言,现在的酒渔等地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形制大同小异。但汉碑及壁画这种文物,即便考古发掘,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其认真保管并广泛宣传,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听着霍氏的故事,看着那些需要仔细揣测才能弄懂或意会的彝文符号,又是另一番感受。看完大成殿,从棂星门准备离开,“……天地有憾,阴阳郁结。四时不和,害气蓄溢。嗟命何辜,独遭斯疾……凉风渗淋,寒水北流。永归蒿里,重昭无期。痛哉仁人,积德若兹。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况于人哉?德行颜渊,亦遇此灾。守善不报,自古有之。非独孝琚,遭逢百罹……滄台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闻如之何?”汉碑上的这些句子仍萦绕在脑际,久久不散。

我想,这一方汉碑,这一座晋墓,既然已经被请进了古城,那就好好地让它们在这里安放吧!



汉孟孝琚碑亭。



之六

历史文化街区——北正街

曹阜全文/图

离开文庙,或者说离开古城的教育中心,我们折而向北,去看具有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北正街。

如果把东南面叫文庙片区,那么,把西北面叫北正街片区也是恰当的。

从辕门口与陡街交汇处往北走,就是北正街了。

北正街很长也很直,约有一公里。至少现在是这样。

这里想介绍的北正街,准备提及的历史文化街区,除了这条笔直的街道,叙述上还会把相关的文化信息拓展到西面和东面至少100米的范围。当然,区域也不一定一定是方方正正的,只要是与北正街离得近的,都放在了一起,与住建、文物部门所规划的历史文化街区,可能会有出入。

首先,从街名的变化入手。《恩安县志》记载:“源泉街,宽一丈,狭处减一二尺,自趣马门至怀远街止。此北正街也。”也就是说,这条街的街名本来就叫北正街,其范围还覆盖了现在陡街拐角的一处,并一直延伸至怀远街。随时间推移,在《昭通志稿》里,文字的表述同上,但在“昭通府城市街道衙署图”上,则看得出这条街已被分割成几条街。从挑水巷往北至建国街巷口,叫炭市街,或许这里曾是卖炭的街市。上面有一段叫破沟。靠半边街一段,因那里曾有牌坊,又叫木牌坊。而真正意义上的源泉街,则是半边街至趣马门这一段。到了《民国昭通县志稿》,北正街又名北大街。在《昭通县城市街道衙署图》中,炭市街则更名为中和街(之前,中和街指的是建国街南段),往北则统称源泉街。辕门口这段,最先起名照壁街,后更名为中兴街。而靠近陡街这一段,则起名辕门口横街,又名宣武南街,最靠近怀远街处,则叫大兴街。从北正街的街名变化,可以看出,这个街区在不同的时间段因为功能的变化,或政治、军事的需要,对名称进行过多次更名。

如果按照上述叙述方式,要把北正街以西或以东的街名理清,可能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我想从存在的文化形态入手来介绍,会省略一些。

先从西边说起,半边街下段,有川主庙,因1931年开办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电灯厂,川主庙被拆除。半边街又因临近恩安府,曾被更名为辅政

街。从炭市街往西的巷子,叫石门坎,后更名为永裕巷、劝业巷。而西面最有影响的是在今市政府南侧,建有城隍庙,这里成了古城市民最乐意的去处。由于人气旺的缘故,广东籍人士在这里修建了广东会馆,古城的富商迟兴周凭借炭市街上的20多间商铺,把挑水巷内的土地买下来,修建了这家大院。

接着往东说。接近趣马门处,是武庙。这里应该以武庙为重点,加上文昌宫的一条街巷,也就是现在的建国街北段,以前叫武庙街,曾更名为尚武街。建国街南段,除了更名为中和街外,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更多是卖中药材或者棺材的,所以曾被叫作仁寿街和棺材铺街。往东再走,就叫居仁街以及泰来街、集贤街、永胜街了。以上是从北向南的介绍。如果按东西方向介绍,辕门口以北,后围墙街起名为德育街,再往北,则是大局街,以前叫履祥街。

北正街这个区域,从布局上来看,既与军事联系紧密,比如镇署衙门、箭道、中旧营,又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草市、药市、炭市、棺材铺等。人多,又是黄金地带,因此,在中旧营以及箭道的功能不再强势后,昭通女子中学应运而生。同时,商人也盯上了这里,古城最大的商人李正荣,在老君庙前,居仁街附近购地,修建了李氏家庙。在集贤街,有一座天主教堂。可以看出,这个区域从商业或民生的角度,都有很多文化业态,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我还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从这个街区走出去的若干名人,他们成为北正街的灵魂。

名气最大的是姜亮夫,故居在北正街的南段,位于辕门口横街和大兴街之间。关于姜亮夫先生的成就与影响,前面已有

述及,在此不再赘述。

坐落在建国街105号的一个由大门、正屋和两厢组成的合院,占地263平方米,因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石榴树,夏天会开满鲜红的石榴花,因而起名“榴花馆”。这里曾是昭通著名学者萧瑞麟的故居,“榴花馆”是萧瑞麟的祖父萧凤翔和父亲萧维琪建设的私塾,萧瑞麟不仅在这里学习,还开办了昭通师范传习所,开了昭通新式教育的先河。此外,在2008年修缮陡街时,曾在陡街上段丰乐巷的夹墙中发现一面土石夯筑的萧氏坊,与萧氏有何关联,只有留待有识之士去考究了。

往东方向的泰来街,走出了抗战英雄——孙承光。孙承光,1906年4月出生于泰来街,1920年就读昭通省立二中,后在成都国立高等师范和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徐州中学、昭通省立二中、武昌省立实验中学任教。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后,孙承光弃教从戎,加入中共冀鲁豫军区部队,参加抗战,直至1942年为国捐躯。

在文昌宫南段,走出了两个金石、考古学者。一个是谢饮润,家住文昌街32号,他传承谢氏家族的遗风,把一生心血奉献给了考古和教育事业,他对孟孝琚碑的考证和霍氏壁画的保护令人敬仰,对昭通文化事业的贡献巨大。他的儿子谢崇岷也传承考古事业,于地方文化、金石、书法研究颇有造诣,从昭通市政协文史委退休后,仍对地方文化孜孜以求,提出了若干良策。

当然,这条街上的文化先贤的事迹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从文化传承到民生日常,从商贾云集到会馆汇聚,从镇署衙门到昭通女子中学,从武庙到城隍庙,北



正街文化街区的业态十分丰富,故事很多,内涵很深厚,值得认真保护、研究乃至科学开发,从而让北正街文化街区成为古城的又一个核心区。

广东会馆。